

孫文的民族論述分析

蕭亞譚*

摘要

民族想像的形成並不僅是藉由論述，民族想像的形成同時也是綜合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實踐過程，這也是本文擇定孫文作為研究對象的緣故。本文主要探究孫文如何理解民族與民族主義？在不同階段，孫文的民族論述是否產生轉折或斷裂？筆者希望透過這篇論文，能對於孫文的民族論述進行理論性的重建。

由眾多符號堆砌建構的中國民族並非是個同質的統一體，這與晚清時期知識菁英的主觀期待有著極大落差。回首過去，中國民族想像的形成乃是一個充滿游移與對抗的論辯過程，筆者將這個過程定性為民族大辯論。

筆者發現孫文的民族論述可區分為三階段，分別為 1894 年至 1911 年的排滿鬥爭論、1912 年至 1918 年的五族共和論、1919 年至 1925 年的中國民族論。孫文並於 1924 年寫成民族主義六講。他企圖透過這六講將其民族論述系統化，這也可視為孫文理解中國民族問題的最後定論。

關鍵詞：孫文、梁啟超、民族想像、排滿鬥爭、五族共和、中國民族

收件 2006 年 4 月；修正 2006 年 6 月；接受 2006 年 9 月。

*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聯絡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612 號三樓，電話：0926-905773，電子帳號：yatan@pie.com.tw。

壹、前言

對於在台灣從事民族主義研究的學者而言，無論其自身意識形態為何，均無法迴避諸如中國人、中國民族等等如何定義的課題¹。究其根本，中國民族的形成過程與內涵定義是導致台灣內部民族認同歧異的源頭。這個認知驅使筆者開始回顧過去，試圖釐清中國人、中國民族的民族想像如何形成。

時序移至晚清時期，眾多知識菁英面臨各國相繼侵入清帝國的政治局勢，紛紛提出各種可能的解決出路，並戮力於中國民族的形成。中國民族此一概念的出現與成形，可說是一個充滿游移與對抗的論辯過程。晚清時期的中國如此，現在的台灣亦復如是。透過長期的爭執論辯過程，各個民族認同得以持續釐清確認其邊界。

民族想像的形成並不僅是藉由平面的文字論述，民族想像的形成同時也是綜合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實踐過程，這也是本文擇定孫文作為研究對象的緣故。孫文雖非晚清至民初的政權掌握者，但在二十世紀初期，除了論述之外，孫文持續透過會黨（同盟會、國民黨）的力量，實際影響政治局勢的變動。本文主要探究孫文如何理解民族與民族主義？在不同階段，孫文的民族論述是否產生轉折或斷裂？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孫文如何推展民族運動？筆者希望透過這篇論文，能對於孫文的民族論述進行理論性的重建。

貳、民族主義文獻回顧

關於民族主義研究，不可避免要先討論民族是什麼？Renan 曾有篇著名的法文演講稿（什麼是民族？）²。這講稿或許啟發了後來的學者；Renan 之後，學者紛紛揚棄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的自然決定因素，如語言、種族等等，轉而重視以人類意志創造民族。Renan 的演講往往被理解為人類意志是民族形成的唯

¹ 使用「中國民族」而非「中華民族」，主因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民族大辯論多以中國人、中國民族等語彙進行討論。

²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ed. Hommi K.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一因素。事實上，Renan 也曾體認民族形成仍有其共通的客觀組成條件。對於民族主義研究而言，Renan 的演講稿應是提醒了我們民族形成所必須包含的主觀層面，也就是包含在「民族意識」字面下有關於情感的、心理的、認同的面向。除了可以感官來覺知的客觀條件之外（膚色、語言…等等），民族必然指涉了成員自身的主觀認同——我們是誰、我們跟他們不同。

許多學者主張，民族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同時也強調民族是一種人為加工物的觀點。Gellner 認為從文化與意志解釋並不能滿足民族形成的原因；他從工業化的視角切入民族主義研究。現代社會形式從農業過渡至工業，因此文化亦需轉型成同質性的文化。Gellner 的研究論證工業化社會導致文化同質性致使民族主義興起，而非民族主義導致同質性；民族主義只是反映工業化的轉變。對 Gellner 而言，民族主義出現要有客觀的社會條件，最重要的是經濟轉型導致文化同質性的需要。至於民族與民族主義二者的關係，Gellner 提出著名的觀察：是民族主義製造了民族，而非民族產生民族主義³。

Anderson 提出民族是個想像的政治社群，其具有疆界限制與獨立主權的政治特質。他對民族的定義：是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這種想像是有限度的（limited）並且是具有主權的（sovereign）。民族之所以為「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員之間也不可能彼此完全面對面或彼此聽聞對方；民族也是一種有限（limited）的想像，因為再大的民族都會有邊界，沒有一個民族其邊界等同於人類全體。民族是個想像的社群，依據一種集體的想像而創造出來，至於民族這個想像社群如何成為真實？他提出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認同的重要性——亦即溝通（communication）對於民族情誼形成具有重要性。由於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同質的印刷語言取代舊有的地方方言；藉著報紙書刊的傳播，建構出有別於以往的集體意識型態與民族想像⁴。

Hobsbawm 則從社會史的觀點來解釋 19 世紀末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在權威君王崩潰後，群眾政治需要新的機制凝聚彼此（如國旗、國歌、國花）；他

³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Blackwell, 1983), pp. 48-49.

⁴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pp. 43-44.

提出「發明傳統（the invented traditio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論點⁵：由於現代國家與傳統社會間存在斷裂性質，因而國家必須重新建構一套習慣，儀式與傳統象徵其歷史文化的悠久與延續；此即「發明傳統」，所發明的歷史與傳統，常常是透過政府有計畫與有組織而形塑完成⁶。

民族主義研究的學者雖然觀點互異，但對於將民族視為一種人為加工物（artifact），似乎沒有太大的分歧，直至 70 年代，現代論者更將民族情誼（nationhood）視為現代性的產品。雖然這個理路提供民族主義研究更豐富的素材，但是現代論終究還是無法釐清何謂民族的歸屬感，或許更重要的是現代論無法包含民族情誼的延展性⁷。現代論者認為民族是現代國家統治下的產物，Duara 則指出，事實並非如此單純。在現代國家統治下，其實同時存在著多種對民族的理解，這些理解相互競爭並進行妥協。現代國家對於民族的概念就是在這樣一種複雜過程中形成的⁸。

Smith 認為，Hobsbawm 的「發明傳統」和 Anderson 的「想像社群」是在現代論者的民族主義研究中，引進了後現代的解構主義觀點，他們把民族主義當成是一種現代的文本加以解構。Smith 認為想像與發明二字在語意的使用上，都很容易滑向「虛構」與「幻想」的意涵。而將民族當成是「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暗示著民族可以被解構成一個個獨立的片段。但 Smith 認為，民族不只是文化再現的加總，其間還有社會學的實體（sociological reality），包括人們的歸屬感、通俗的文化資產與傳統…等等⁹。

⁵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⁶ Hobsbawm 的觀點延伸出一個問題，即是為何公民權或自由主義的機制不能凝聚認同，而仍需要符號與象徵？

⁷ Alon Confino, *The Nation As a Local Metaphor: Wuttemberg, Imperial Germany, and National Memory, 1871-1918* (US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⁸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0 (1993), pp. 7-8.

⁹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參、研究方法

關於民族主義研究，不僅可從政治菁英的論述加以考據，論述內容或可看出其民族意識的展現；也可從政策面向觀察國家如何藉由確立疆域邊界及改造意識型態來促進民族認同。

回到本文的主題，雖然孫文是位著名的民族主義者，筆者發現以孫文為對象的民族主義研究卻是相對稀少。周陽山、楊肅獻編輯的「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是對於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者提供一個全面性的初步描述¹⁰。朱宏源¹¹、賀凌虛¹²與張國聖¹³主要以文本作為分析孫文民族論述的依據，而且均以「對外」、「對內」作為檢視孫文民族論述之判準。林國仁¹⁴以「民族自決」作為理解孫文民族論述的主軸，孫錫忠¹⁵則以功能論的視角探討民族與國家的關係。

筆者整理發現，研究孫文與民族主義的相關文獻均不脫上述觀點，但他們的共同盲點在於缺乏民族主義理論作為研究基礎與指引，致使其研究的學術價值大幅滑落。例如，雖然以「對外」、「對內」的二元對立作為分析架構，但是並沒有觸及孫文如何區分內外彼此為不同群體。事實上，如何想像我群與他群的邊界才是民族主義研究的核心價值。

從方法論而言，作為一個研究者其實無法提問「民族是什麼？」Hobsbawm曾謂：民族顯然是套套邏輯，若想瞭解民族是什麼，只能藉後設原則（*posteriori*）去理解；因為真實的民族是既定的後設產物，只有在成形之後才能進行事後的檢驗¹⁶。筆者將以歷史研究途徑為主，試圖理解孫文提出民族論述的

¹⁰ 周陽山、楊肅獻編，李國祁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年）。

¹¹ 朱宏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滿族文化》，第15期，1991年，頁4-10。

¹² 賀凌虛，〈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及其實施政策的演變（上）〉，《近代中國》，第107期，1995年，頁196-216。賀凌虛，〈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及其實施政策的演變（下）〉，《近代中國》，第108期，1995年，頁290-314。

¹³ 張國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的民族思想〉，《元培學報》，第5期，1998年，頁249-269。

¹⁴ 林國仁，〈孫中山民族自決思想之研究〉，臺灣大學三研所碩士論文，1990年。

¹⁵ 孫錫忠，〈民族主義的功能與國家現代化初探：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為張本〉，台灣師範大學三研所碩士論文，1991年。

¹⁶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外在情境為何。方法則以孫文的民族論述作為文本進行分析（孫文發表的講演、宣言、文告為主），藉此釐清孫文如何看待中國民族問題。

肆、民族大辯論

如先前所言，民族想像的形成並不僅僅仰賴平面的文字論述，民族想像的形成同時也是綜合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實踐過程。由眾多符號堆砌建構的中國民族並非是個同質的統一體，這與晚清時期知識菁英的主觀期待有著極大落差。回首過去，中國民族想像的形成乃是一個充滿游移與對抗的論辯過程，筆者將這個過程定性為民族大辯論。

這場清末民初的民族大辯論曾經出現多元異質的民族想像，Fitzgerald 整理這些不同的民族理解：改良派以特殊的儒家文化定義中國、自由派共和論者把中國視為國民共同體、革命派以族群與血緣來確認民族邊界，共產黨則是用社會階級作為民族同胞的衡量標準¹⁷。國內學者沈松僑亦著墨頗多，沈松僑多援引梁啟超的文本以描述民族想像的形成過程，他並嘗試對於這場民族大辯論建構改良派與革命派二元對立的分析架構¹⁸。沈松僑雖然以歷史學的深厚學養為二十世紀初期的民族大辯論整理出豐富的文獻資料，例如民族英雄的不同系譜、黃帝與孔子紀年的符號爭奪，但筆者要指出，沈松僑嘗試建構改良派與革命派二元對立的分析架構有著理論層次的缺陷¹⁹。這個二元對立的分析架構並無法掌握晚清時期民族想像形成的內在動力，也無法解釋新國家建立之後，孫文為主的革命派對於五族共和論的迅速支持。

筆者認為，這場民族大辯論具有兩個特性：就族群身分而言是以漢族為主，就階級屬性而言是知識菁英的參與。由於參與民族大辯論的主體均是漢族的知識

¹⁷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⁸ 沈松僑，〈我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1997 年，頁 1-77。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頁 77-158。

¹⁹ 民族英雄的不同系譜，意指存在「抗禦外族」與「宣揚國威」兩類民族英雄；紀年的符號爭奪則指涉以血緣與文化作為判準的兩種民族史。為了修補理論層次的缺陷，沈松僑於 2002 年放棄這個二元對立的嘗試，並將之劃歸為知識菁英為主的啟航期。筆者認為，賦予民族大辯論二元對立性並不具有現實意義。

菁英，這個結構性因素促使革命派的排滿主張壓倒改良派的滿漢融合理想。

在這場民族大辯論中，梁啟超始終是個積極的參與者。從民族主義到大民族主義再轉化為國民主義，我們可以看出梁啟超對於中國民族問題的思考脈絡，他以清帝國的疆域為中國民族的邊界，於 1903 年正式標舉「大民族主義」，呼籲國內各個族群融合，共同形成一個中國民族：

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後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矚於五大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者也²⁰。

晚清時期的政治反對陣營，主張排滿鬥爭論的革命派逐漸取得優勢。這也使梁啟超為主的改良派提出對抗性的民族論述：以「國家」作為認同對象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從梁啟超標舉「大民族主義」開始，他揚棄以「漢族」作為民族想像的邊界，轉而與其「新民」學說相互結合，構成以「國家」為核心的國民主義論。

回顧當時的政治局勢，梁啟超的民族論述並未得到清王室的善意回應。清王室對於他的國民主義論述消極以對，也沒有採納其主張成為官方的民族政策。1898 年戊戌政變之後，梁啟超為主的改良派陷入一種尷尬的情境，既沒有政治權力實現其民族論述，也不似革命派選擇與清王室劃清界線。面對革命派的漢民族主義挑戰，梁啟超的主張在現實政局中逐漸被邊緣化。

歷史告訴我們，在這場民族大辯論中，改良派與革命派並沒有分出勝負，主因是這場大辯論與現實政治局勢的變化並沒有高度關聯。改良派的主張雖然未得到清王室的支持，革命派的主張也未在新國家建立之後具體落實。外在情境的演變雖然是清王室和平退位，革命派表面獲得勝利，但 1911 年的革命最終是由袁世凱取得政權。袁世凱並非是這場民族大辯論的參與者或忠實聽眾，掌權之後也沒強調漢族重新統治的族群政治意涵。

²⁰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之十三，（臺北：中華書局，1983 年）。

民族大辯論之後，無論是孔子或是黃帝，最終均成爲中國民族的歷史敘事與文化資本。這場由漢族知識菁英發動的民族大辯論並沒有擴散到其他族群，致使這場辯論只是漢族知識菁英之間的辯詰攻防。這樣的觀察可以充分解釋新國家爲何完全繼承清帝國的既有疆域，建國前後的革命派主張爲何南轅北轍，民間社會爲何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族群衝突等等。

伍、從排滿鬥爭到五族共和的理性選擇

民族主義者看待疆界內外群體的態度截然不同：對外創造差異；對內創造相似。筆者把民族主義的意涵限定在政治層面：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型態，也就是政治（state）邊界與社會邊界一致，並且其統治者屬於該社會的成員²¹。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通常有三個層次：它是一種教理（doctrine）、是一種政治運動、同時也是訴諸情感²²。至於民族認同，則是一種含括政治與文化面向的身份建構。基於上述定義，筆者發現孫文的民族論述大致可區分爲三階段，分別爲 1894 年至 1911 年的排滿鬥爭論、1912 年至 1918 年的五族共和論、1919 年至 1925 年的中國民族論。

在新國家建立之前，孫文的民族論述是以「排滿鬥爭」作爲核心概念。孫文所屬的革命團體（興中會）於 1894 年（光緒二十年）成立，其誓詞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類訴求便帶著族群民族主義的色彩。1906 年，孫文在日本東京演講：「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爲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²³。這是民報發行週年的場合，孫文在此具體指出，堅持排滿是因爲統治者並非我族（漢族）成員。直到革命團體形成策略聯盟（同盟會），其發表的軍政府宣言亦充分表露出漢族中心史觀²⁴。

²¹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 1.

²²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2-3.

²³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第三冊，頁 9。

²⁴ 「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233）。

俟建立新國家之後，孫文的民族論述迅速修正為強調漢、滿、蒙、回、藏之「五族共和」論。1912年，孫文在五族共和合進會的演講為1911年的革命作了定位：「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則？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占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洲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其種族不平等，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他接著提出政治號召：「所望者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共同負荷之大責任也」²⁵。在第二階段，孫文有意識地揚棄革命派使用的排滿鬥爭號召，轉而借用改良派的五族共和論述。為何其民族論述於建國前後產生如此的轉折？這促使筆者進而回溯當時的外在情境。

1912年初，各省代表會議與臨時參議院分別通過決議，使用五色共和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同時通過鐵血十八星旗為陸軍軍旗²⁶，1913年（民國二年）通過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海軍軍旗。鐵血十八星旗為黃興的華興會旗幟，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是孫文的興中會旗幟。對於民族主義研究而言，旗幟是具有高度參考價值的符號與象徵。透過對於新國旗與各軍種旗幟的議決，筆者發現：對於中國民族的新興想像而言，五族共和論獲得當時政治菁英的多數支持。在當時，象徵漢族統治的鐵血十八星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只成為保衛新國家的軍種旗幟。

新國家建立前後，孫文的民族論述產生極大轉折（或者斷裂）。筆者認為，這轉折是因為孫文希望新國家能繼承清帝國的疆域，故改以五族共和的政治號召鞏固既有版圖，並試圖防堵滿、蒙、回、藏各族以孫文先前倡導的民族論述複製各自所屬的民族國家。如果佐以當時的政治演變，會發現新國家完全繼承了清帝國的疆域。對於孫文而言，五族共和論雖然是改良派的民族論述，但由於滿足當時現實政治的需要，所以迅速加以借用。

陸、漢族核心的中國民族論

從1919年開始，孫文再度修改他的民族論述。1919年的「三民主義親撰

²⁵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三冊，頁72。

²⁶ 十八星代表關內的漢族十八行省。

篇」提及，「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祇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²⁷。這裡透露出孫文要求民族同化的端倪。

隔年，他於中國國民黨本部演講：「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我們中國許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個中華民族」²⁸。從這段演講稿可明顯看出，此時的孫文已放棄「五族共和」的政治號召，轉向訴求打造單一同質的「中國民族」。

1921年，他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時，再度批判五族共和論：「本黨應以美國為榜樣。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或有人說五族共和揭櫫已久，此時單講漢族，不慮滿、蒙、回、藏不願意嗎？此層兄弟以為可以不慮，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底表徵。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作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底機會。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²⁹。

這段話明確揭示孫文如何看待漢族以外的各族，他認為各族均與西方各國相附和，而且蘊釀分離運動的可能。這個階段的孫文，其民族論述以美國民族作為理念類型。他期望透過民族同化的方式，打造一個以漢族為核心族群的中國民族。

²⁷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二冊，頁335。

²⁸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三冊，頁218。

²⁹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三冊，頁227-228。

柒、民族主義六講

累積三十年的政治運動與政治參與經驗後，孫文於 1924 年寫成民族主義六講。他企圖透過這六講將其民族論述系統化，這六講也可視為孫文理解中國民族問題的最後定論。首先，孫文提倡民族主義的動機為何？他自承「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³⁰。

孫文於第二講提及他認知的民族史，他認為「從有稽攷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³¹。在孫文的理解中，中國民族是個持續存在之實體，這是民族主義者的典型思維：會將自己的民族史回溯至遠古不可考之處。

至於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他主張二者有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武力造成的」。孫文認為，民族起源於自然力：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強」。但是，他卻認為中國是二者重合的民族國家，這可從他把中國民族主義稱為中國國族主義看出：「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³²。他認為國族主義的語彙之所以適用於中國，正因為中國是單一民族國家³³。

孫文強調中國是單一民族國家，這與前文所提第三階段的中國民族論一致。但仔細檢視他如何看待元、清兩個帝國，可發現這個國族主義論述出現矛盾之處：民族主義第二講中，他解釋在政權上中國亡過兩次國，分別為元朝與清朝，但在民族上沒有受過大損失。此處為了詮釋漢族綿延不絕的民族史，將國家與民族切割看待。隨後的第三講中，他則承認歷經兩度亡國之後，這個民族的民族思想也隨之滅亡。依照第二講與第三講的文本進行分析，這之間顯露出民族主義者思想層次的矛盾：如果依照第三講的敘述，一個沒有民族意識（民族思想）、沒有政治權力的社群，如何被視為第二講的「民族」並持續存在？

孫文於第四講評論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他贊同民族自決的概念。但他隨

³⁰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6。

³¹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12。

³²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3-4。

³³ 「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4）。

即提及中國與鄰近各國之間，歷來講究和平相處與自由意志的歸順；這間接暗示因為沒有受到漢族壓迫，中國週遭各國與境內各族不存在民族自決的問題。至於如何看待各國的壓迫，他認為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³⁴。

關於如何恢復民族主義、恢復民族地位的方法，則出現在五、六兩講。他認為要恢復民族地位，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這需要兩個條件：第一是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是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聯合成一個國族團體³⁵。簡而言之，孫文推展民族運動雖是以啓蒙民族意識為主，也因應現實參雜固有社群與固有道德等概念。

筆者發現，孫文雖然試圖將他的民族論述系統化，但是就連民族主義六講也存在著前後牴觸的思想矛盾。對於如何理解民族與民族主義，孫文所提出的論述多半基於外在情境的需要而非內在邏輯的思考；這顯示孫文是基於工具理性進行選擇而成就其民族論述。

捌、結論

Duara 指出，兩種基本概念交互影響著中國政治社群的形成：文化主義與族群中心論，這兩種概念的競爭反映在二十世紀初的民族大辯論³⁶。面對當時的政治局勢，中國的知識菁英曾出現不同民族想像的爭辯：改良派是認知各國的侵略為要，主張君主立憲團結反抗侵略；革命派則是主張先進行排滿鬥爭，再處理各國侵略的問題。兩派民族主義者分別以康有為、梁啟超與章炳麟、孫文作為代表，其核心差異在於如何看待清王室與所屬族群：是接納滿族成為新國家的核心族群，還是讓漢族奪回核心族群的地位。

³⁴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44。

³⁵ 他在後文補充，「除了大家聯合作成一個國族團體之外，還要把固有的舊道德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第一冊，頁 46）。

³⁶ 1924 年的民族主義第三講，孫文認為亡國不至於喪失民族思想；之所以喪失民族意識是因為文化主義使然，此處可見孫文對於文化主義的批判。

沿用 Duara 的研究成果，我們看到不同的民族理解彼此競爭妥協的例證：一是康有為和章炳麟之間關於保皇或排滿的爭辯，二是孫文在中國民族固有論和中國民族革命論之間的游移不定。康章之間的爭辯基本屬於文化主義和族群中心論的爭辯，孫文民族論述的轉折與斷裂之處在於：當其主張中國民族是世界上形式最完全的民族、中國人民向來就是一個民族（*people-nation*）時，孫文很難宣稱他的民族論述具有何等嶄新的意義³⁷。

歷史已經告知我們，這場民族大辯論沒有任何的政治勝敗，主因是這場大辯論與現實政治局勢的變化並沒有高度關聯。改良派的主張雖然未得到清王室的支持，革命派的主張也未在新國家建立之後具體落實。清帝國轉型為民族國家的嘗試雖然沒有成功，孫文的民族論述也始終未成為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這是因為孫文未曾實際掌握政權的緣故。

孫文的民族論述之所以多次修改，筆者認為這是孫文審時度勢的理性選擇行為。從此處可以對照孫文與梁啟超二人的不同：梁啟超的民族論述是以清帝國疆域作為民族想像的邊界，孫文的民族論述則是回應現實政治局勢的理性選擇。梁啟超的轉變是基於內在的邏輯思考，可看出連貫性與深化的痕跡。孫文的轉變則是基於外在的現實需要，可看出各個階段的轉折與斷裂。以前文所提三階段的民族論述為例：先以「排滿鬥爭」為主要訴求，俟建國之後主張「五族共和」，最後確立為以漢族為核心的「中國民族」。筆者發現，孫文於不同階段的論述內容與民族想像彼此衝突。

民族主義研究顯示，「共和」是民族運動的內在要素。對於清王室的正當性沒有獲得受治者的同意，孫文採取將漢族與滿族標誌為我群與他者的二元對立策略，作為政治反對運動的內在動力。新國家建立之初，孫文迅速擁抱五族共和論述，俾便於新國家順利繼承清帝國的疆域。等到局勢稍定，孫文放棄過渡性質的五族共和論，並希望藉由民族同化的方式，促使中國最終走向以漢族為核心族群的單一民族國家。

民族主義理論不僅強調菁英的作用，亦認知需要人民的加入方能使得民族運動風起雲湧。那麼，我們要如何確認民族情誼是否存在？以發明的傳統與想像的社群這兩個著名的概念而言：在何種層次，發明的傳統可以被人為建構？什麼樣

³⁷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pp. 11-13.

的社會條件，對於民族的想像可以與多數的受治者產生共鳴，進而成爲一種集體的我群意識？孫文對其民族論述修改數次，可以反證民族大辯論只是知識菁英之間的辯詰攻防，尙未引發人民的迴響參與。筆者目前無從得知當時各個族群如何回應政治菁英的論述丕變？這或許可以留待未來更深入加以探討。

如前言所述，台灣內部民族認同歧異的源頭是關於中國民族的形成過程與內涵定義。孫文逝世之後，後繼者接力充填中國民族的內涵。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總統更透過國家機器強化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族」意識形態，使之成爲定於一尊的正統價值。直到台灣進入民主轉型過程，中國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等概念才受到挑戰，台灣的知識菁英從而展開了另一次的民族大辯論。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朱謙，1993，《孫中山與蔣中正的民族主義思想：1894-1975》，臺北，黎明文化。
- 朱法源，1991，〈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滿族文化》15：4-10。
- 余建華，1999，《民族主義：歷史遺產與時代風雲的交匯》，上海：學林出版社。
- 沈松僑，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77。
- 沈松僑，2000，〈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77-158。
- 沈松僑，200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49-119。
- 林國仁，1990，〈孫中山民族自決思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三研所碩士論文。
- 周陽山、楊肅獻編，李國祁等著，1982，《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 孫錫忠，1991，〈民族主義的功能與國家現代化初探：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爲張本〉，台灣師範大學三研所碩士論文。
- 梁啓超，1983，《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
-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1989，《國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賀凌虛，1995，〈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及其實施政策的演變（上）〉，《近代中國》107：196-216。

賀凌虛，1995，〈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及其實施政策的演變（下）〉，《近代中國》108：290-314。

張國聖，1998，〈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的民族思想〉，《元培學報》5：249-269。

外文部分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Breuilly, John

1993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revise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2)

Calhoun, Craig

1997 *Nationalis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nfino, Alon

1997 *The Nation As a Local Metaphor: Wuttemberg, Imperial Germany, and National Memory, 1871-1918*. US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uara, Prasenjit

1993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26.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Blackwell.

Hobsbawm, Eric J. and Terence Ranger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tzgerald, John

1996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nan, Ernest

1989 "What Is a N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882) in Hom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Smith, Anthony D.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The Analysis of Sun Wen's National Discourse

Ya-Tan Hsiao⁺

Abstract

The forming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is not completed only by discourse, but is also formed by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proces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For the reasons I choose Sun Wen as the subject of my research, specifically his apprehension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At different stages does Sun Wen's national discourse oscillate or fracture? I hope that this thesis can reconstruct an abstract view point on Sun Wen's national discourse.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a homogenized unity of abundant symbols. This has been shown to be a great failure by the subjective expec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of the Ching Dynasty. As we look to the past, the imagined Chinese nation is the process of replete with conflicting vacillations. I orientate the process as the great debate of nationality.

I have summarized Sun Wen's national discourse into three stages: the theory of struggle with the Ching dynasty (1894-1911), the theory of five clan republicanism (1912-1918), and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1919-1925). Sun Wen combined and wrote Six Chapters of Nationalism in 1924. He plans to systematize nationalism by writing the six chapters. This is also viewed as Sun Wen's conclu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issues.

Keywords: Sun Wen, Liang Qi-chao, national imagination, struggle with the Ching dynasty, five clan republicanism, the Chinese natio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